

<<丁玲在北大荒>>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丁玲在北大荒>>

13位ISBN编号：9787509800928

10位ISBN编号：7509800927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郑笑枫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丁玲在北大荒>>

前言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想，延安时期与丁玲并肩战斗过的老文艺战士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

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

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

笑枫同志撰写的这本书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

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

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

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

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

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

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

”“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

”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丁玲在北大荒>>

内容概要

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就扣在丁玲头上；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又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从此一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12年的无罪流放生涯。

12年，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女人，在寒荒地带，是如何熬过来的？

在北大荒，丁玲既感受到纯朴群众的友情关爱，也受尽奚落歧视，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

但她奋起“飞蛾扑火”的精神，以钢铁般的意志在冰锋刺骨的环境下熬炼，最终和北大荒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

本书是丁玲的朋友、原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郑笑枫根据采访陈明等人，并深入北大荒实地访问后写成的一部纪实报告，真实再现了丁玲在北大荒的感人经历。

同时附有丁玲、陈明等回顾北大荒生活的文章，是深入流放者内心世界的的一个难得文本。

<<丁玲在北大荒>>

作者简介

郑笑枫，中共党员，1925年生，大别山区湖北英山人。

红军烈士子女，祖父在五次反围剿时牺牲，父亲在长征时牺牲，事迹均存英山红军烈士纪念馆。

1944年参加新闻工作，先后任《新湖北日报》（鄂东版）、第十战区《阵中日报》、南京《新民报》等报社记者、特派记者；参加大别山诗歌社创作活动，主编并编辑《五月》文艺月刊、《青年文艺》月刊及《青年文艺丛刊》等。

1948年在地下党南京市委文委新闻分委领导下，在新闻战线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工作；1950年调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同年调入《光明日报》；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1957年被划为右派，撤销行政十三级工资级别，按右派二类处理，发配北大荒853农场二分场右派队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28元；1978年中央为错划右派改正时，组织复查认为“1957年鸣放期间郑笑枫同志没有右派言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决定取消原整风领导小组的处理结论，恢复政治名誉。

上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一批评定新闻界高级职称时，被评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2002年7月1日离休。

著有诗集《雪，落在十二月里》，散文及报告文学集《黑龙江流域纪行》、《熔炉烈火》、《我们到了西北》、《枫》、《风雨丹心》、《陶铸传》及《丁玲在北大荒》等。

入选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版《中国新闻界名人》及《当代中国名人录》等。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丁玲在北大荒>>

书籍目录

我的自传序题记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 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向左村”农场来了“大右派”“我愿意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纤笔一枝谁与似在宝泉岭农场 附：三访汤原 附：追叙夜审丁玲 附：记入狱重返北大荒归来华发苍颜永不消逝的活力最后一篇作品飞蛾扑火非死水止 附：我怀念她 附：风雪人间跋再版后记

<<丁玲在北大荒>>

章节摘录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

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

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

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

日夜聒聒地叫。

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

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

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

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

”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

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

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候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

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

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

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

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没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

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

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陈明的心头一酸，可又不敢向她说明：严寒的日子，已经落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

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

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

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

“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

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

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

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

<<丁玲在北大荒>>

”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头石头落地了。

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

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地告诉她。

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的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

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

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

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中宣部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

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

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中宣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

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

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议，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

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

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

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

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

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

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

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

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

有些为复查“丁、陈反党集团”调查取证的同志，也受到株连，划成右派，当时《文艺报》的总编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

唐因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

<<丁玲在北大荒>>

“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唐因平反后，带着唯一的女儿回到北京，老伴却永远留在了黑龙江。

陈明更难免要遭劫难。

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

丁玲被揪出来后，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

处理右派，有所谓“六类七种”的政策。

“罪行”最严重者属一类，处理有二种：一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二类者，监督劳动，撤销一切职务，每月发28元生活费；三类者，降职降薪，留用察看；四类、五类者，降职降薪。

按这五类处理的右派，一般都将被送下去劳动改造，但若年过半百，可以留在机关劳动。

一些得此“照顾”的右派，留在机关当杂工，做些打扫厕所之类的活，遭人白眼，备受凌辱，心里还后悔没一起下去。

都是右派在一起，日子还好过一点。

受六类处理者，须是“头面人物”不论其“罪行”大小，工资和职务只降一级，并可不去劳动。

当然，不论受哪一类处理，是党员则开除党籍，是团员则开除团籍。

陈明被划定为二类右派，每月发28元生活费。

他已经接到通知：春节过后，就要同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右派们一起，到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

丁玲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当然属“头面人物”。

经全国政协讨论，按六类处理，留在北京，不必去北大荒。

1958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丁玲夫妇两人安静地坐在寂寞的家里，他们在考虑：今后怎么办？

那时小兴安岭林区正在建设，丁玲特地从报纸、画报上剪下小兴安岭伊春的建设图片，她还买了介绍贵州山区的一些书籍。

她对陈明说：“我们国家的林业太落后了，听说森林覆盖率只占全国土地的12%还不到，我们去小兴安岭，或者到贵州山区，去搞林业吧？”

陈明说：“我们都作了这样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丁玲又恢复了她那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爽朗性格，说：“中国有句绿林豪杰的壮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鲁迅不是早就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陈明为丁玲担忧：“我先走了，你身体又不好，怎么办？”

“你去吧！”

丁玲说，“不要不放心我。”

陈明征求丁玲的意见，是不是把他将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事，告诉作协党组一声？

丁玲连忙阻止说：“不要说了。”

说了，会照顾你，把你留下来。

我们俩不是都心甘情愿地要到东北去嘛！

陈明临行前一天，老两口凄然地坐在一起，拍了一张临别合影……陈明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又把他正在整理的丁玲生前最后一部遗作《风雪人间》的手稿，交给我看。

我默默地读着，我的眼睛湿润了。

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把我带进当年风雪人间的难忘的回忆之中。

也是这个季节，北大荒的冰雪刚刚开冻，我和陈明等许许多多同命运的同志一起，乘上一列“右派专车”，从北京直赴北大荒。

丁玲在书中写的每一个细节，凄然而又带着浪漫遐想的心境，我都亲身经历过，都是我熟悉的。

我为书中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感动了。

这位一生历经坎坷、驰名中外的著名女作家，饱含与党和人民血肉相联之情，向读者敞开她光明磊落的心灵和博大的胸怀，衷而不伤地讲述着在突然袭来的残酷打击面前，她的迷茫，她的悲痛，她的信念，她的追求……读完《风雪人间》，我感到自己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应该把这部丁玲为这段难忘的

<<丁玲在北大荒>>

往事而写的遗作，早些奉献给读者。

这里，摘录《风雪人间》的一些章节：之一：意外的判决……一切可以令人眷念的恩情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十分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制片厂通知陈明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相互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踏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然前进。

我们相信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之二：寂居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

显得十分空寂。

三月过去了，四月来了，院子里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地自个儿开着。

……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嘤嘤啜泣，……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癞蛤蟆似的呱呱地叫着自己不愿听的虚伪的声音。

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呱呱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我虽然有过迷茫，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

我相信党，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着这一天。

……我应该不必羞愧，我应该无所畏惧，扫除迷茫，承担苦难。

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之三：悲伤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现在人们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万里长空，只有蒙蒙的迷雾一片。

之四：火柴陈明来信，宝清县853农场，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所谓“右派”大约有一百多人，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左右，都在有为之年，如今都背着黑锅，发配边疆，每月只发28元生活费。

他的来信，都以最愉快的心情，描述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的无穷乐趣。

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王震司令员冒着春寒去看了他们。

王震向他问起了我，他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王震说：“好嘛！

她来我同意。

”火柴，我已经感到你的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之五：何去何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按右派六类处理，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我想：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这种处境，我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创作？

不必犹豫了。

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之六：轻装不是就要我“重新做人”吗？

我决心真正地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

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天上不会落下奇迹，有人不希望我下去，想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

……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是拿不走的。

之七：前进6月中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并且特地选了一位转业军人陪同去，他也坐软卧。

这可真是特殊的照顾。

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自己支付呢？

按常规，犯人应该由主管司法公安出钱，“解差”的旅费，更不应该由我这个“犯人”来支付。

之八：介绍信到中宣部拿介绍信，却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

可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

<<丁玲在北大荒>>

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为什么这么变？

没有人向我解释。

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创作，谁能批准哪个刊物能发表我的作品？

又有谁胆敢照常例支付我稿费呢？

我只能靠陈明的每月28元钱的生活费生活了。

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 蒋祖林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

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

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

我于8月4日晚9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

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

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

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

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

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

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

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

我极度地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

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

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

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

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

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

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

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

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

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

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的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

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

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

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

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

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

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

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

<<丁玲在北大荒>>

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

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

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结果就是如此。

”

<<丁玲在北大荒>>

后记

《丁玲在北大荒》是1987年丁玲逝世后的第二年，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时任报社总编辑杜导正同志亲自出的题目，让我去北大荒采写的。

这篇纪实报告，也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坛上“左右说丁玲”的是是非非，如实地记录了当年丁玲受极左路线的迫害，硬是被人为地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北大荒劳动，生活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历程用事实表达她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记述了这位早在30年代就蜚声中国文坛的左翼著名作家，身处逆境，蒙受不白之冤，坚贞不屈，沉入生活底层，与人民生活在一起的真实经历，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

丁玲从人民中间重新赢得了人的尊严和最高无尚的评价，被北大荒人称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

这篇长篇纪实报告，同年8月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刊载半个月，第二年(1989年)9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当年与丁玲并肩战斗的老作家们，对《丁玲在北大荒》的出版，都表示十万分的欢迎和赞许。

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在丁玲今年逝世二十二周年之际，决定增订再版《丁玲在北大荒》这本小册子，让广大读者，尤其是今天年轻一代的读者，在风雨严寒的北大荒荒原的足迹上，重温这位杰出的左翼文坛上无畏的战士，走过的每一步艰难的岁月。

<<丁玲在北大荒>>

编辑推荐

《丁玲在北大荒》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丁玲在北大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